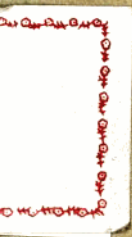


方志 演变概论

FANGZHIYANBIANGAILUN

王晓岩 著



辽 沈 书 社

序

方志天地，广阔无垠，在这里辛勤耕耘的人们大有可为。五年前，王晓岩同志以所著《历代名人论方志》索序于我，岂料我那寥寥数语，竟堂而皇之冠诸篇首。迄今五年过去，在我不过悠悠岁月，转瞬即逝，而晓岩君连连写出了《方志体例古今谈》等论著。近又新成《方志演变概论》一书，并再次要我作序，回首往事，实在觉得无条件完成这一任务。然而《方志演变概论》付梓在即，又迟疑不得，只好以先睹为快，就此说几句读后感而已。

首先，方志演变之类著作，社会上非常需要。其中最需要者莫过于编著新方志的广大工作人员。据统计，截至1989年底，全国行政单位，省级的三十一一个，县级的约二千个，地级、市级的六七百个（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之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这些单位绝大多数都有常设的地方志机构和十几人至数十人不等的修志工作人员。近期全国每年出版的省、县志成果或阶段性成果，大约均在百部上下。要提高全国数万名修志人员的业务水平，保证新编志书的质量，研究和借鉴旧方志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这就需要已知八九千种旧方志的来龙去脉有个清楚的估价和正确的认识。可以说，对已往地方志的演变认识得越深切，对编著新的地方志越有帮

助。当然，需要了解地方志演变的不只是正在从事修志的工作人员，其他方面的如在行政、经济、文化，以至军事、司法、民族等岗位上工作的人士，也都很需要方志演变的知识。众所周知，地方志被誉为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尽管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作此观有害无益，甚至很可能把方志的编修引入歧途，而我则仍坚持视地方志为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因为这不不仅仅是一种看法，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谁能否定地方志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称地方志为“真博物之书也。”（《河南志序》）可谓一语破的。地方志内容的广泛性，是其重要价值之所在。梁启超对此有极精辟之论，他本来对地方志的编纂看法并不好，说“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抄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但是他高度评价地方志有珍贵的资料可用，宣称“其间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特别是和全国性的正史相比，地方志的用处尤其更大，如谓：“以我国幅员之广，各地方之社会组织，礼俗习惯，生民利病，樊然淆杂，各不相侔者甚伙。而畴昔史家所记述，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囿囿画一的施設，其不足以传过去现在社会之真相明矣。又正以史文简略之故，而吾侪所渴需之资料乃摧剥而无复遗，犹幸有芜杂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谓良史者所吐弃之原料于糞秽中，供吾侪披沙拣金之凭藉，而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所以可贵也。”（《清代学者整旧学之总成绩三》）正因为地方志如此宝贵，所以在社会上除得到编修方志这一庞大队伍的特殊青睐以外，还受到许多其他方面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光顾。但是无论什么人，要想挖掘这一宝藏，从中得到应有的教益，都有必要熟悉地方志的演变，知道什么时代、哪些地方志能为我所用。故而我敢预

官，王晓岩同志的《方志演变概论》问世，将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受到普遍欢迎。

其次，地方志的发展源流表明，它有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论其源，有人就“方志”之名，主张始于《周官》；有人就方志著作而言，提出或产生于《禹贡》，或发端于《山海经》；还有人就其渊源变化，称古代的国史，如晋之《乘》、楚之《杻机》、鲁之《春秋》，都是地方志，等等。具体而微，大家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这些都是情理之中的，不足为奇。原因就是论者均站在一定的时代立场上，以当代地方志发展的标准去衡量最早的地方志，或云此是彼非，或褒此优而贬彼劣。如同现在，我们编写地方志，已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完整的体例，比较统一的模式，以此去审视古代的地方志，总觉得它们不完善，不是条件不具备，就是志书有缺欠。论方志的形成，各抒己见，迄无定论。这都无妨，我感到最重要的是探明已有之说的真谛，搞清他们所指的方志名称、著述及理论，在地方志形成过程中特有的地位与作用，明了地方志非形成于一朝一夕，也非起源于一部著作，是长期的集各种因素的结果。又如地方志发展的“流”很长，如何划分其阶段与时期，是个大问题。现在这也有几种说法，比较一致的是视宋代为方志的“定型”期。这也不自今日始，清儒纪昀已有所论，他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及间假借夸饰，以修风土者，抑又甚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地理类序》）在这位纪氏看来，最古的地方志所载为山川、风

俗、物产而已，原书不可见，《禹贡》、《周礼》仅可反映其大致情形，历唐、宋，逐渐增加人物、艺文，地方志书臻于完备，元、明以后，体例相沿，只存在破例的现象，没有根本变化。问题是，地方志的发展变化不单单表现在体例上，还有大的时代背景，包括的内容，思想观点，等等。纪昀是二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其说也当分析对待，非可一概奉为主臬。王晓岩的《方志演变概论》，以绝大篇幅论述了从古以来直到民国年间，方志发展演变的过程，详细地划分了各个时期并举出了代表作。这就是说，他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惟书，不惟古，经过个人的钻研，提出了相应的意见。

再次，《方志演变概论》一书，既应社会需要而出，又就地方志的渊源和演变这一大问题发表了许多看法，这都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人们承认方志演变是个大问题，就不能期望一部二十万字左右的著作，把它所有的疑问全部解决，而且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和意见，有的也不一定谁都同意。我感到特别应该称赞的是王晓岩同志率先把方志的演变作为研究的对象，为其专门著书立说，即使本身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将唤起更多学者关注，开展进一步研究，推动方志学的深入发展。此外，这部方志学新著，条理清晰，叙事简明，文字流畅，从全面上看，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力作。兹祝王晓岩同志在方志学研究上的又一成功和《方志演变概论》的出版，庆贺方志天地喜获丰收硕果。以上谨为序。

孙文良

1992年元旦

目 录

序

第一章 方志的渊源 1

第一节 方志名称的由来 1

第二节 方志起源于古代国情资料 2

第三节 先秦典籍对方志的影响 4

第二章 方志的产生时期 9

第一节 方志伴随郡县制应运而生 9

第二节 秦汉的各类志书 12

第三节 班固的《地理志》 21

第三章 方志的雏形时期 25

第一节 方志在动荡时局中纂修不辍 25

第二节 盛极一时的地记 29

第三节 由盛转衰的郡书 34

第四节 异物志与赋体志书 38

第五节 方志雏形的代表作 41

第四章 方志的发展时期 47

第一节 定期纂修图经制度的确立 47

第二节	大规模的修志活动	52
第三节	志书体例的发展	60
第四节	方志理论的初创	64
第五节	方志名家贾耽的贡献	70
第六节	李吉甫与《元和郡县图志》	74
第五章 方志的定型时期		80
第一节	修志的盛况	86
第二节	内容的拓宽	93
第三节	体例的定型	101
第四节	理论上的建树	113
第五节	名家与名志	120
第六章 方志的继续发展时期		131
第一节	《一统志》及其对修志事业的推动	131
第二节	元明两代的志书	142
第三节	统一凡例的推行	157
第四节	理论研究的深入	170
第七章 方志的鼎盛时期		175
第一节	高潮迭起的修志活动	175
第二节	三修《一统志》	184
第三节	行之有效的修志制度	191
第四节	修志活动的鲜明特点	202
第五节	志书的内容与体例	214
第六节	方志理论的成熟	226
第七节	章学诚创立方志学	237

第八章	方志的变革时期	247
第一节	修志的概况	247
第二节	内容与体例的变化	256
第三节	方志学研究的成果	265

第一章 方志的渊源

我国的修志事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方志起源于何时，其渊藪何在，古今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方考辨，作出了各种解释，迄今未有一致的结论。清代学者皮锡瑞说：“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①研究方志发展的历史，首先需要回答其渊源问题。

第一节 方志名称的由来

“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官》，其中《地官司徒》篇记载：“诵训，掌道方志。”《周官》，亦称《周礼》，托名周公所作，清初学者毛奇龄考定为战国时书，近人梁启超认为：“必曾参考战国时多数国家的政制，取长补短，加以个人之理想而后成书，而战国政制赖以保存者必不少。”^②这一说法，已得到学术界公认。可见至少在战国时期，“方志”一词就已经出现了。

当时的“方志”，究竟作何解？汉代学者郑玄说：“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檮杌》。”^③这就是说，当时所谓的“方志”，是指诸侯国的史书，它虽然与后世的方志概念不尽相同，但后世把地方志书称为方志，

① 《经学历史》19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3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周礼注疏》卷26。

至少在用词上受到过《周官》的启发。

西晋文学家左思在《三都赋序》中说：“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他的《吴都赋》中又有：“方志所辨，中州所美。”南朝历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论》中说：“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说：“余以永平中，蒙除鲁郡太守，会上台下列山川，以方志参差，遂令寻其源流。”^①他们所说的“方志”，已与后世的方志差别不大。

从上述可知，方志的名称，起源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涵义已经基本上稳定，而且被人们广泛采用，一直沿袭到今天。虽然“古籍名称，每无定则”^②，仅考名称远远不够，但至少可以发现其中的某些联系，为探寻方志的渊源提供一点线索。

第二节 方志起源于古代国情资料

国情资料虽属现代用语，但进行国情调查却是自古有之。《隋书·经籍志》在阐述方志渊源时说：“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风气所生，刚柔轻重，饮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迁变。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这就是说，统治阶级为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对国情进行周密调查，掌握详细资料，以便制定对策。远古情况已难考知，《周官》中对此记载较多。

其一，地理资料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

① 《水经注校》6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133页。

鄯、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①”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②”郑玄解释说：“道，说也。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③职方氏掌管地图，土训官讲说地图，让周天子知道天下土地、邦国位置、各族人民、经济状况、山川形势、利害关系等等。

其二，历史资料

外史“掌四方之志”④。郑玄解释说：“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桡杙》。”⑤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⑥”郑玄解释说：“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⑦外史掌管邦国史书，由诵训官进行讲解，让周天子了解古代史事，以其兴衰成败为鉴戒。

其三，邦国现实资料

小行人出使诸侯国，完成使命之后，还要撰写五种调查报告书。“其万民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愿、犹犯令者为一书，其礼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凡此物者，每国辨异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⑧”小行人出使诸侯国，兼有调查研究的任务，撰写“五书”向周天子报告每一个国家的政治、教化、礼俗、民情等现实情况。

这三方面多门类的国情资料，也是后世方志所必备的。因此，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说：“《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

① 《周礼注疏》卷33。

②③⑥ 《周礼注疏》卷16。

④⑤ 《周礼注疏》卷26。

⑦ 《周礼注疏》卷16。

⑧ 《周礼注疏》卷37。

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①他主张方志导源于《周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王存在《进元丰九域志表》中说：“臣闻先王建国，所以周知九州封域，与其人民之数者，诏地事则有图，诏观事则有志，比生齿则有籍。近世撮其大要，会为一书。”^②图、志、籍，都是国情资料的组成部分。元代黄渭在《东郡志序》中又说：“潘窃惟昔之言地理者，有图有志，图以知山川形势之所生，而志以知语言土俗博古久远之事。是以成周之制，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而道地图以诏王者，有土训之官焉。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诏王者，有诵训之官焉。”^③他们主张方志导源于《周官》，是指《周官》中所记载的职方、土训、诵训、小史、外史等官的职掌与后世方志有渊源关系，而这些官员的职掌，恰恰与国情资料有关。因此，我主张方志起源于古代的国情资料，而不是某一部具体的书。

第三节 先秦典籍对方志的影响

古今学者对方志的渊源有各种说法，有源于《周官》说，有源于《禹贡》说，有源于《山海经》说，还有源于《诗经》说，源于《尔雅》说等等。尽管认识不一，但他们都从先秦典籍中探索方志的渊源。可见先秦典籍对方志影响之大。

一、《禹贡》与方志

唐代宰相李吉甫在阐明撰作《元和郡县图志》之缘起时

① 《河南志序》，《司马温公文集》卷66。

② 《元丰九域志》卷首。

③ 《黄学士文集》卷16。

说：“自黄帝之方制万国，夏禹之分别九州，辨方经野，因人纬俗，其揆一矣。”^①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撰作《九域志》，“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②清代文学家王士贞在《长山县新志序》中说：“余惟志之昉也，其《禹贡》乎？”^③他们都把《禹贡》视为方志源头。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学者考定为战国时人所作。全篇主要分为九州、导山、导水、五服等部分。

九州，是假托大禹治水以后，把全国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每一州分叙山川、湖泊、居民、土壤、田赋、贡品、交通等情况。

导山、导水，是依据山脉高低及其分布，诸川走向及其流经地势，分别依次叙述。

五服，是以王都为中心，向四方展开，把全国依次划分五个地带，分别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每服相距五百里。

在战国时期，诸侯争雄，分割天下，实际上并没有九州的行政区划。《禹贡》的九州，是以自然地理特征来划分的，不过是反映作者期望天下统一的理想而已。五服，也是作者的一种幻想。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彼疆此界，犬牙交错，不会那样方方正正。

从内容上看，《禹贡》参有想象成分，九州也不是实际的行政区划，因而还算不上地方志书。但它毕竟是我国较早的一篇地理著作，对后世方志，尤其对全国总志分区记载的体例较有影响。导山、导水部分的记述方法，对方志的山川门类也有

①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

② 朱思本《九域志·自序》。

③ 《渔阳山人文略》卷1。

一定影响。例如，《同治南城县志》形势门的《小序》称：

“夫舆地有记，肇自《禹贡》，先之以山，可以识水所从出；因山志水，可以稽水所由。”^①晋代挚虞撰《畿服经》，其书名或许与“五服”有关。总之，《禹贡》对后世方志有一定影响。

二、《山海经》与方志

宋代绍圣四年（1097），兵部侍郎黄裳建议兵部职方重修《九域志》，宋哲宗“诏秘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检阅。”^②欧阳志在《舆地广记序》中说：“凡自昔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地志，旁见杂出，莫不入于其中。”他们都认为《山海经》与方志有渊源关系。

《山海经》，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地理书。它由《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组成。传说为大禹、伯益所作。其实书中三部分并非成书于一时。晚近学者考定，《山经》成书最早，大约在春秋末战国初，其余两部分成于西汉。

《山海经》记述地理山川、风土、民情、物产、祭祀、巫医、神话传说等等。

《山海经》虽然成书早于《禹贡》，但对后世方志的影响，却不如《禹贡》大。其中记载动物、植物、矿物，及神话、怪异等内容，对方志中物产、古迹、异闻等门类也是有所启示的。因而，有人认为方志导源《山海经》。

三、《诗经》与方志

元代《至正金陵新志》附载《修志文移》称：“古者诸侯国置

① 《江西地方志序跋凡例选录》196页。

② 《玉海》卷15。

国史以纪国政，采诗以观民风……后世州郡，各为志书，亦此之遗意也。”清代浙江督学王揆在《重修浙江杭州府志序》中说：“古者，天子巡行方岳，亲适诸侯，必命太师采诗以观民风。凡齐夸郑淫唐勤魏俭，悉举而贡之于天子。盖稽是以周知俗尚之美恶，政治之得失也。此后世郡邑之志所由昉乎？”^①他们认为《诗经》与方志渊源有关。

《诗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十五国风，即各国的民歌。这些民歌的搜集，与古代的采风问俗之制有关。《汉书·食货志》记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采风问俗，也是搜集国情资料的一种手段，与方志的渊源有一定关系。但《诗经》本身，充其量不过是方志中艺文或文征门类的渊源。正如章学诚所说：“文征，义本十五国风。”^②

四、《尔雅》与方志

南宋史学家郑樵说：“志之大源，起于《尔雅》。”^③明代夏良胜在《正德建昌府志序》中说：“《尔雅》，志之宗也。”^④清代闾兴邦在《贵州通志序》中也说：“志之大源，起于《尔雅》。”^⑤如果说郑樵未必专指方志而言，那么夏良胜、闾兴邦为方志作序，他们无疑是专就方志而言，即认为方志源于《尔雅》。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词典。现存19篇，分别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

① 《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第426卷。

② 《湖北通志序》。

③ 《通志·总序》。

④ 《江西地方志序跋凡例选录》35页。

⑤ 《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第423卷。

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尔雅序》说：“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味，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这说明《尔雅》专在解释词义名物，辨别名实异同，是一部词典，同方志风马牛不相及。把《尔雅》视为方志之源，未免有些牵强。当然，《尔雅》按事类分篇，对方志横分门类的体例，也许会有所启示，但却不能视为方志之源。

上述诸书是前代的文化成果，对后世的文化发展，不可能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方志的纂修者，长期受到古代典籍的熏陶，潜移默化地接受其影响。他们在纂修志书时，或于内容上，或于体例上，或于记述方法上，汲取前代典籍的长处，逐渐形成地方志书的独立特点。

这些先秦典籍，只是对方志的发展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还不能视为方志的渊源。方志的真正渊源，还是周官职掌的国情资料。

第二章 方志的产生时期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为了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使诸侯割据称雄的历史不再重演，经过反复辩论，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初分天下为36郡，后增为40郡，郡下设县。秦朝二世而亡，经过楚汉战争，刘邦打败项羽，在汉高帝五年（前202）登上皇帝宝座，建立了汉朝，史称西汉。汉承秦制，仍然实行郡县制。在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中，刘秀以恢复“汉官威仪”为标榜，平定群雄，于建武元年（25）建立东汉王朝，东汉继承西汉制度，继续实行郡县制。秦汉时代的郡县制度，是地方志书产生的基础。

第一节 方志伴随郡县制应运而生

先秦时期的国情资料，同方志虽有渊源关系，但其本身并不是方志。一些典籍对后世方志虽有影响，它们毕竟也不是方志。例如，《春秋》除了记述鲁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灾异之外，对齐、晋、秦、楚、吴、越、郑、宋等国的史事也予记载，它已超越了地方志书以方为限的记述范围，实际是以鲁国纪年为序的编年史，而不是地方志。《禹贡》记载九州的山川、土壤、贡赋、交通等，对后世方志影响较大，但其“九州”并不是实际的行政区划，而是自然地理的分区。它只